

中国古代两种
认识论的斗争

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斗争

潘富恩 瓯 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斗争

潘富恩 阮 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75 字数 44,000

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0,001—370,000

统一书号: 2171·40 定价: 0.14 元

毛主席语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引 言

人类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史。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于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不同看法，形成认识论上的对立和斗争。这是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的始终的。

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产生的？这是认识论的首要问题。从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时代起，哲学家们就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分为两大营垒。在论战中，他们提出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感觉、认识是外部世界的反映，知识才能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获得；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才能是先天具有的，“天（神、上帝）”赋予的。这正是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哲学上的这种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页）。因而在认识论上的每个斗争，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刘少奇一类骗子，继承了新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妄图从古代奴隶主、地主阶级思想武库中拾起一些破烂，与无产阶级较量。长期以来，他们卖力地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竭力反对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观点，否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二页）的伟大真理。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为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在认识论问题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坚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不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我们读点哲学史，了解历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斗争的发展规律，对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对于当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更深刻地理解马列主义著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将把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作一简要通俗的介绍。

目 次

引言

- 一 春秋战国时代在认识论上的激烈论争 1
- 二 两汉至隋唐时代在神学和反神学斗争
中两种对立的认识论 22
- 三 两宋至明清时代在唯心主义理学和反
理学斗争过程中关于“知”“行”问题的
论争 43
- 四 从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斗争的历史看
先验论的破产 66

一 春秋战国时代在认识论上的激烈论争

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全面崩溃，封建制逐步形成的时期，社会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奴隶主、封建主等剥削阶级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战争，前有“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后有“战国七雄”（韩、赵、魏、楚、燕、齐、秦），造成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方面是没落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奴隶、农奴及小私有生产者阶层反抗剥削阶级奴役的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以新的封建制代替旧的奴隶制。因此，是维护旧的奴隶制还是建立新的封建制，就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这在意识形态方面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和变化。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竟长争高，互不相下，出现了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为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在哲学上，他们提出了“天”与“人”、“道”与“气”、“名”与“实”等等有关宇宙观的根本问题，展开唯

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唯心论的营垒中以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以及诡辩学派的惠施、公孙龙等为代表；唯物论的营垒中以“农与工肆（手工业作坊）之人”即小生产者阶级的思想家墨子与后期墨家，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子、韩非等为代表。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观点，正是当时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一）孔孟鼓吹“生而知之”、“不学而知”的先验论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前四七九年。他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生而知之”^①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观点。这包涵有三个基本内容。一，鼓吹“生而知之者上也”，也就是说“圣人”的知识才能是天生的，最上等的，是通过“默识（主观主义的思辨）”获得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二，宣传普通人虽然可以“学而知之”，但只是次等的。孔子的所谓“学”，并不是向从事生产斗争的劳动者学习实际的知识，而是向“圣人”学习先验的、天生的“知识”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当他的学生樊迟想学习如何种田时，他就大骂樊迟是“小人”^②，因为在他

① 《论语·季氏篇》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② 见《论语·子路篇》。

看来，君子“好学”，只能“学文”。所谓“文”，不过是“诗书礼乐”，即殷周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孔子吹嘘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认为只要继承周代奴隶社会的思想和典章制度，就能一通百通，预知百世以后的事情。这说明他的所谓“学而知之”，是以“生而知之”为基础，以陈腐的“文”为内容，以复古为目的的。三，诬蔑劳动人民“困而不学”，天生愚蠢，是最下等的。孔子认为劳动人民有时也能“困而学之”，但这是因为“小人学道则易使”^②。向劳动人民灌输点忍受压迫剥削的“道理”，为的是便于奴隶主阶级的驱使、奴役。实际上，他根本反对劳动人民掌握知识文化，所以他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③统治阶级之为“上智”与劳动人民之为“下愚”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④可见他被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完全是为奴隶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巩固其反动统治制造舆论的。

孔子从先验论出发，大叫什么“才难！”^⑤认为天生之才是很难得的、少见的。他说什么象“唐虞（即尧舜）”那样的盛世，能治理天下的仅有“九人”，而“舜有臣五人”就能使“天下治”^⑥。他宣称，一切制度法令由“天子”来决定颁行，天下就“有道”，就太平，否则，天下就“无道”，就混乱^⑦。这正是把帝王以及少数所谓有天生才能的“贤人”，看作是社会命运的决

① 见《论语·为政篇》。

②③ 见《论语·阳货篇》。

④⑤⑥ 见《论语·泰伯篇》。

⑦ 见《论语·季氏篇》。

定者，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充分暴露了孔子的唯心史观的丑恶嘴脸。

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我)”，^①认为他自己的才德就是天生的。他的学生子贡也吹捧他是什么“天纵(降)之将圣(即大圣)，又多能也。”^②孔子及其弟子之所以这样自我吹嘘，是有其反动的野心的，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说如果由他执政，他将充当奴隶主阶级的“救世主”，迅速、有效地恢复周代的奴隶制度，挽救奴隶制度“礼崩乐坏”的局面，镇压奴隶的反抗，并抵挡新的封建制的形成。这正是孔子的反动政治目的。

孔子的反动哲学观点，被战国时代的孟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名轲，生卒年为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他是一个主张“万物皆备于我”^③的主观唯心论者。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音朔 shuò)我也，我固有之也。’^④认为人们的仁义道德、政治思想和知识才能都不是从身外来的，而是人们内心所固有的。人们不要向外界学习，也不要去思考，只要通过内心的追求，即所谓“尽心”，就能获得知识才能。所以，他又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⑤这也就是说“良知”、“良能”既不是人们向外界学习得来的，也不是由于外界的影响而引起思考的结果，它们都是天

(1) 见《论语·述而篇》。

(2) 见《论语·子罕篇》。

(3)(5) 见《孟子·尽心上》。

(4) 见《孟子·告子上》。

赋的，即所谓“此天之所与(赋予)我者”^①。这完全是从“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引伸出来的先验论观点。

孟子还认为，“圣人”是上天所降生的“先知先觉”者，上帝创造人类就是要使那些“先知”“先觉”的人来启发和开导“后知”“后觉”的人^②。他恶毒地说，广大劳动人民天生缺乏“仁、义、礼、智”，不过是所谓“离禽兽不远”的“野人”而已，根本无法启发和开导。因此，孟子鼓吹“劳心者治人(统治别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人统治)。”^③的反动谬论，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应该永远受剥削阶级奴役的牛马，把剥削阶级的所谓“先知先觉”的“圣人”，看作是肩负着“天降”的“大任”，决定着社会历史命运的永恒统治者。孟子又宣称，天生的实行“王道”的“圣人”是罕见的，五百年才出现一个^④。在当时，这个“圣人”恰恰就是孟子自己，他肩负着启导“后知后觉”者的责任。^⑤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⑥自吹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治理”天下，他的所谓治理天下，就是搞奴隶制度的复辟活动。这充分暴露了孟子这个主观唯心论者的反动野心，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孟子狂热地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完全是为巩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

① 见《孟子·告子上》。

② ③ 《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③ 见《孟子·滕文公上》。

④ ⑤ 见《孟子·公孙丑下》。

(二) 老庄宣扬“不行而知”、 “无知即真知”的先验论

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学派是“道家”，它的创始者老子及其后继者庄子也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鼓吹者。老子相传即老聃(音丹 dān)，姓李名耳，生卒年不详。老子的哲学是一套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其中尚包含着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老子认为，“圣人”不须通过实践就可以获得知识，能够不出家门而知道天下大事，不向窗外察看，也能了解自然界的各种道理^①。老子完全否认“行”或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认人的耳、目、口、鼻这些感官的实际活动(接触外物)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败坏)，驰骋畋(音田 tiān)猎令人心发狂。”^②在老子看来，人们观看各种颜色，倾听各种声音，品尝各种味道，不但不能够认识它们，反而会使自己眼睛瞎，耳朵聋，口味倒；同样，骑马打猎之类的运动，会造成思想混乱。总之，老子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五官的感性活动不仅不是认识事物的始基，反而是使人们愚笨的开端，而一切知识都是“圣人”先天具有的。

① 老子《道德经》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音有 yǒu)，见天道。”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② 见《道德经》。

如前所述，他所说的“知”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是在与外界完全绝缘的“虚静”的境界中，去认识那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这正是反动的先验论观点。由于他认为人们的实际知识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有害，因而他提出“绝圣弃智”——杜绝聪明，抛弃智慧和“常使民无知无欲”的反动主张，竭力鼓吹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

老子也是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导致唯心史观的。他认为天生的“不行而知”的“圣人”都是心胸广大，以天下为己任的，老百姓“鄙俗”而“愚蠢”，只能听从“圣人”的摆布和愚弄。老子鼓吹这种反动的哲学，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到他所理想的“圣人之治”的时代，实际上，不过是要恢复奴隶主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而已。

老子的这种“不行而知”、“绝圣弃智”等等反动理论，在他的继承者庄子那里，发展到了更加荒谬的地步。他用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来反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庄子名周，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到前二八六年之间。在《庄子》这部书中，有“物物者（道）非物”^①的论点。所谓“物物者”，前一“物”字是动词，是创造或派生的意思，第二个物字指宇宙万物。全句是说创造或者派生万物的，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而是一个精神实体，即“道”，“道”就是虚无。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这个“虚无”的“道”所派生的，是“无中生有”的，因此，事物本身也是虚无缥缈、变化不定

（1）见《庄子·知北游》。

的。他说,“知”必须有个被认识的对象才行,对象既是变化无定的,人们又怎能认识它呢?他又说,人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是危险和徒劳无益的。^①他最后的结论是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客观事物。这是利用诡辩来否定人类认识事物,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宣扬不可知论。

在这里,庄子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从虚无主义的“道”出发,把认识对象——客观事物看作虚无缥缈、变化无定的东西,因而是不可认识的东西。其出发点和前提就是荒谬的。因为在唯物主义看来,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虽然是运动变化着的,但它的存在却有其相对的稳定性,有其质的规定性。其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反复地接触事物,就能认识它们。第二,庄子完全不了解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辩证规律。诚然,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但从整个人类来说,生命现象是连续的,不断发展的,因而,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用辩证法观点来看,人类认识事物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反杜林论》第八四页)诚然,思维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

① 《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中才能得到解决，但决不能因此否认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成功地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结果，就证明认识的可靠性。所以，庄子的不可知论，只能是荒谬的诡辩。

庄子还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大肆鼓吹“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即各有各的是非，很难断定谁是谁非^①的相对主义的谬论，完全抹煞人们的认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他认为人们争论知识的真伪都是“无用之辩”；追求知识只会引起“天下大乱”，“天下每大乱”就是因为“罪在于好知。”^②在他看来，“无知”是最好的，只有“无知”才是“真知”，只有“无知”的人才是“真人”。

这种“无知”的“真人”或“真人”的“无知”，是通过所谓“坐忘”的功夫而形成的。什么是“坐忘”呢？他说，一个人毁弃了自己的肢体，抛掉聪明，废去知识，和他所虚构的什么“大通”融通为一，象段枯木头一样，无知无觉，这就叫做“坐忘”^③。因此，庄子就把“浑沌”、“无知”当作最理想的境界，鼓吹从根本上取消认识，进而毁灭人类一切文明生活的蒙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反动思想。

这种荒唐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而已。实际上，庄子并不是那么“虚无”的。他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

① 见《庄子·齐物论》。

② 见《庄子·胠篋》。

③ 《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度深恶痛绝，而不能忘情于正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旧制度，希望旧的制度和秩序能够继续下去。但是，与孔孟不同的是，他感到奴隶制的全面崩溃已无法挽救，感到绝望。因而在“悲乎”、“命也乎”的哀鸣声中，采取了“安之若命”的处世态度，一面对正在死亡的奴隶制唱哀歌，一面竭力诅咒和消极反抗新兴的封建制度。这是“无可奈何”^①的结果。庄子鼓吹上述反动哲学，正是当时已经没落了的奴隶主阶级彻底绝望、极端颓废的思想反映。

（三） 惠施、公孙龙在认识论上的诡辩说

与“道家”老、庄学派有密切联系的诡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也是属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惠施生年不详，卒年为公元前三一〇年，是庄子的朋友，曾当过魏国的宰相。提倡“合纵”政策，来抵制秦国。在哲学上，他用相对主义的诡辩术来反对辩证法，同时也用来取消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他在论证所谓“合同异（把相同的和相异的東西合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的命题时，提出许多诡辩的说法。他说：天与地一样低；高山与泽地一样平；白狗是黑的；火是不热的；蛋有毛；龟比蛇长^②等等。惠施完全抹煞事物质的规定性及其差别，从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否定客观真理。因此，

① 《庄子·人间世》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② 《庄子·天下篇》。